青海兴学记－创办西宁湟川中学经验谈

王文俊

一、创建缘起

青海位于我国西陲，居青藏高原，位于祁连山与巴彦克拉山之间，黄河长江均发源于此。境内有我国唯一之咸水湖，蒙语名库夕淖尔周围三百余公里，因而名其地。自古以来，各族杂居，汉为西羌所居，东晋以后为吐谷浑所占，唐入吐蕃，明为蒙古族所据。清初罗卜单津据其地叛，雍正帝命年羹尧等讨平之，置青海办事大臣（1725)。民国竣改称办事长官，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改为行省，以西宁为省会。青海省地域辽阔，在我国行省中，仅次于新疆。居民族系复杂，亦仅此于新疆，计有藏族、蒙族、汉人、东干回（所谓东干回乃指形状语言与汉人无异，只是宗教信仰不同从而有若干习俗不同而已)，尚有所谓土人，其来源为何，无人研究。观其面貌，颇似蒙族，笔者疑其为西夏后裔，但只是推测而已，因笔者并非民族学者，不敢断定其来源。青海因系高原，故气候寒冷，每年农历九月，地下即已凝冻，须至次年二月杪开冻，农作年仅一收。农产以青稞为大宗，小麦亦有相当收获，余为杂粮。其他出产以皮毛为主，但为主政者所控制，人民所得，仅余唾而已。矿产以煤为主，亦产黄金，其生产与买卖亦为皮毛，为专人所断，采金者所得，仅是糊口而已。青海地下有丰富之石油，尤其柴达木盆地最丰，但当政者无此知识，货弃于地，闻共匪在柴达木已掘井廿余口，产量甚巨。由于历来当政者的统治与搜刮，人民大都贫困，文化与教育水准之低落，自在意料之中。由于境内民族复杂，语言歧异，故在文化与教育方面之创建与开发，亦倍感困难。故欲对文化教育有所贡献，非从根开始做起不可，而从根本做起之道，自以政治改革（原文为“政 改革”，编者猜测如此）为首要，而此点又为当时时势所不许，唯一的途径，只有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之一法，以仅聊胜于无而已。

二、实地考察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顾名思义，乃是管理英国退还我国逊清光绪（原文为“诸”，应为笔误）庚子年拳匪之乱，配给英国赔款的机关。照两国的协定，以这笔钱投资建设事业，尤其是交通事业。于是该会以该款的大部分，投资于完成粤汉铁路的修筑，其次则是招商局购船及其他如电讯事业等。投资的利息所得，利用已文化教育及其他建设事业。该会鉴于西北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决定每年补助法币二十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算小的数字（也就是等于廿万银元）。该会过去补助文教事业，多半是经过申请审核手续，讲款项拨交补助机关学校，根据审定计划运用。这次补助西北教育，为求有实际效果，乃事先组织一个考察团，先往实地考察，视其实际需要，拟作有效之运用。该会乃聘陶孟和、顾颉刚、郭有守、作者及英国董事泰勒等五人为委员，组团前往考察。时全面抗战业已爆发，我们并不因而停顿，五人中除郭有守氏出任陕西教育厅长，不及前往外，其余四人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去、先飞兰州，作实地考察。兰州为西北重镇，傍黄河而建，河上建有铁桥，作行人车马交通之用。此一铁桥闻为黄河上第一座桥，建与平汉铁路黄河铁桥之先，亦颇难能可贵。兰州虽为西北重镇，城垣并不十分广阔，街道亦颇狭窄，市面相当萧条，人口亦不众多，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交通不便，人事与物质交流不畅，遂导致一切建设受阻，文化教育事业自不例外。我们到达兰州之后，曾分别参观考察教育实况。以中等学校而论，从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到工农职校，大体具备。高等教育，则设有甘肃学院一所。我们经过详细观察与分析，其共同缺点，皆在师资与设备之欠缺；教学方面，则以科学教育之落后最为重要。我们经慎密计论后，决定建议设立科学教育馆一所，一方面仿湖北省科学实验馆之例，将全兰州中等学校之科学实验，集中在科学馆分校分时举行；另一方面对各校之科学教育，作有计划之辅导。这一建议，为董事会所接受，次年即正式成立，聘梅贻宝博士为馆长，开展工作。

我们在兰州事毕之后，即前往青海考察。青海省北接甘肃，其省会西宁距兰州以汽车

一日可达，但须快速赶路。我们包租了一辆卡车，所以一日到达。当时青海省主席为马麟氏，据闻实际权力，却操之其侄马步芳将军之手。我们考察青海之学校教育，在学校种类、形式与实质各方面，又远不及兰州之学校。由马步芳所创办之回教中学，虽在规模上形式上似较省立学校为优，但据我们观察的结果，其实质方面并好不了多少。我们考察的结果，认为要全面改革青海的学校教育，既不在我们的职权之内，也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唯一的办法，只有设立一所学校，作为示范和带头作用。我们计议的结果，就向庚款会作此建议，蒙该会采纳，这就是湟川中学诞生的由来。

三、建校过程

我们的西北考察之行，只到了甘青两省，宁夏则由于交通较难以及时令将届冬季，未及前往。这个时候，抗战形势（原文缺“势”字）逆转，京沪沦陷，中央政府已迁至武汉，我们回到汉口，向庚款会报导结果。我们建议在甘青分设一馆一校，均被董事会长朱骝光先生总干事杭立武先生（1904—1991），安徽滁县（今滁州）人。1923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 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其间并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及中英文协会。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 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两年后调政务次长。1949 年出掌教育部。1991 年病逝。采纳，除兰州科学馆聘梅贻宝博士负责，前已言之之外，在青海所设之一校，决定由作者负责。作者虽只负责建校，但对科学馆所需之仪器图书，因梅馆长并未聘定，亦不在武汉，乃由作者代办。作者乃请湖北省立科学实验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具应有仪器清单，在汉口购置。武汉为仅次于上海之大都会，当时抗战军兴不久，所储存之仪器图书，尚可敷用。一切购置齐全后，即以火车运至西安然后雇卡车数辆（原文为“量”）运往兰州。作者及随行工作人员数人押运，首次经历黄土高原，起初尚不觉得为何荒凉，进入山区之后，除黄土之外，别无所有。有一山地

名华家岭者，全长约三百华里，除有两三处可供打尖住宿之小店外，居民极为稀少。沿途不见一颗树木，仅见有少数倒塌废弃之土屋，显系原住人不能生存乃弃之而去。作者推究其原因，乃饮水困难之故，人类缺水自不能生存，只有弃之而另谋生存之道。我们到达兰州之后，交割带来之物品，略事休息，即携带学校应用物资前往青海。此时青海省主席，已由马麟易为马步芳。至此，马氏治青，已历三世，马氏与青海，几乎有不可分离之势，足见国民政府之统一，也只是名称而已。我们到达西宁之后，立即租赁民房，作为筹备办公之用，一面进谒马步芳主席，不幸被托辞拒见，这也在意料之中。适逢教育部派员来甘青公干，乃乘其见马之时随同前往，终获一见。当我提出建校问题，马即表示不同意，但作者意在必成，并不因之气馁，乃托马最信任之医院谢院长说项，终于获得默许（谢院长名慈舟，四川人，曾任立法委员现* 已作古　　* 1981 年）乃正式进行筹备。

我们来到青海，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及所携之图书仪器外，别无所有。设校必须有校舍，省政府既不拨给房舍（实际上也无适当校舍可拨），唯有从新做起。首先要做的是购地，可是购地并不简单，因为地方人士风闻马主席不赞成我们建校，所以多不敢售地与我们。几经奔走呼号，在西宁城外两三公里之处，地名贾小庄，购得约千坪土地，暂作建校之用。由于西宁并无营造商，只能包工并不包料，而且泥木工必须分包，由自己购料，不得以只好为此进行。幸而当时聘有一工艺教员，尚能作图，乃根据地形，与之商酌分布情况，一律修建平房，故施工较易。时当夏令，暑假开始，一面积极建筑校舍，一面制备校具，同时进行招生。招收新生以初一及高一为主，另招附设小学一年级及五年级新生。至此，这所学校，总算正式成立了。

四、师资选聘

一个学校的好坏，因素固然很多，而师资的优劣，却是个决定性的条件。青海因交通不便，生活所需之物质设备，欠缺甚多，尤其是医疗卫生方面之设备为最。西宁虽设有一

省立医院，但医师阵容及医疗设备，不但较东南及华北方面相去甚远，即与后因无人开刀而病故两人。故往青海工作之东南或华北人士，为数极微。抗战军兴，由华北尤其北平撤退至西北者，颇不乏其人，但亦皆止于西安及兰州，更往西去，则为数极少。作者在兰州极力罗致，因本人在国内系北大毕业，故聘北大毕业者四五人，北师大毕业者三四人，清华毕业者二三人，均可称一时之选，阵容极为坚强。截至我于卅四年春离开时，教师之坚强阵容，始终不衰，盖该校自创办三年以后，由于升学率逐年增高想，校风良好，故许多人乐于来校任教。我们所聘任之教师，多半为青年才俊，已婚者不多，故大部分居住校内，而且多数好学，亦喜运动，对学生之影响甚大，由于师生之间接触频繁，形成水乳交融状态，身教言教感情并重，爱的教育，可于该校见之。

五、施教原则与实行

本来教育部对于所谓普通中学（包括高初中），在很早以前就订立有中学法及中学规程两种法令。后来虽有修正，但基本精神仍然存在。我国中学教育（包括高初中）的基本原则，为下列各点：一、锻炼健全体格；二、陶镕公民道德；三、培养民族文化；四、充实生活智慧；五、培养科学基础；六、养成劳动习惯；七、启发艺术兴趣。这七条所标示的，不仅涵盖了德智体群四育，而且还注重美育，为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所宣导的。可是，教育目标订立的完美无缺，并不就表示实施得尽善尽美。以作者几十年得经验和观察，我国的中学教育，始终是以知识为中心，其他的只是装饰点缀而已，不但没有五育并重，即使四育三育并重，也很少实现。这一现象与事实，不仅中国如此，其他的国家，即令是欧美日本，也并没有真正做到五育或四育乃至三育并重的程度。因为即令在今天，不论中外东西的中学，大多把教育的重点呢置于知识之上，所以我曾于二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知识学校与教育学校》，载于当时政大教育学会的刊物《杏坛之上》。在这篇文章上指出，今日世界的学校形式，无疑的是源于西方。西方的学校教育，截止现在为止，或多

或少仍保持着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以传授知识为主；第二、与生活脱节和社会隔离，这点缺点，曾被许多教育家注意到，而裴斯塔洛奇是首先一个。他不主张学校只是以知识传授知识为唯一的任务，更反对教育与生活脱节和社会隔离。所以他首先提倡乡土教材原则和工作原则，要引导儿童自幼就和故乡发生不可分离的精神关系，由此逐步扩大，直到民族国家乃至更大的范围，与之发生精神连结。总之，教育不能与生活脱节和社会隔离，而工作原则，也是适应这一主张的。即令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那么，中学教育所传授的应该是什么知识呢？一般人都把中学称作普通中学，则所授的知识，当然就是普通知识了。然则什么是普通知识呢？我们绝不可能从今天世界上浩瀚无垠的知识中，划出一部分出来，命名为普通知识。因此，在严格的意义内，所谓普通知识，根本就不存在。还有，现在一般中学所授的知识，绝大部分是书本知识，各种科目尽然。德国大教育家克欣斯坦纳（Kerschen Steiner）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活知识，一种死知识。凡来自课本的知识，都是死知识，只有工作中得来的知识，才是活知识。死的知识，不能启发青年人的创造精神，只有活知识才可能。所以他主张放弃书本的死知识，而主张在工作中获得活知识，把目前的书本学校，改变为工作学校。他这个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只是实行起来无论在方法方面、设备方面还是师资方面，必然要大力克服许多极难克服的困难。

德国哲学家兼教育家普兰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为国际驰名的学者，作者留学德国时，即出其门下。他曾对国民教育有所主张，提出四项基本条件。他认为今天新学校教育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句流行的术语来概括：即“整体的要求”。所谓整体，并不是一堆不痛不痒、毫无所谓的食物所构成，而是一种有机性的整体。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四个基本原则，即：1、乡土教育原则;2、工作原则；3、集团原则；4、内在深入原则。这四个原则之中，前三个早就有人主张过和试验过，例如前面所引的裴斯塔洛奇就也主张由内在出发来连结，正式提出过前二者，不过在今天却有其簇新和特殊的意

义而已。前面三个原则，多半侧重外在的连结，但重点毕竟放在外在之上。所以必须要内在深入原则，来发生制衡作用。如果只注重集体而不同时注重内在，那很可能逐渐趋向机械的集体主义，如在铁幕世界内所实施的。在那里只注重集体而抹煞个体，发展群性而消灭个性。个体在那里只是一部大机器里面的零件，只有随着整部机器转，不能有任何主张与作为。他们根本就否定人类内在的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恰恰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没有它，世界就没有今天和明天，文化就没有现在和未来，人生也就没有意义和希望。他们为了维护其政权，所以必须要窒息它和消灭它。 而我们则相反地要发掘它开发它，只有发掘出这种宝贵的财产，才能够使我们日趋光明，文化日趋灿烂，人生日趋高尚。也只有由这种财富所织成的集团，才是有朝气的集团，才是有活力的集团，才是有希望的集团。所以每一个教员要重视这一原则，要尽量设法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内在，从那里发掘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施普兰格认为这是每一个教员的庄严任务，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不过在这上面要注意的，此种任务也只是发掘和引导，而不是“作成”和“塑造”，否则就和机械论者代学生制造意识，安置意志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深入内在加以发掘之后，让他自动生长，引导其趋向正确合理的世界观与理念，然后从这种世界观和理念出发，以追求高级生活。只有从人类内在深处，才能升华起人生的意义，只有从那里才是高级生活的出发点，那才是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如果窒息它，那必然使文化僵化，人生机械化。这种发掘与引导工作，当然十分艰巨，只有用“了解”和“爱”，才能完成这种任务。教育学生而不了解他们，那只是隔靴搔痒，没有接触到要点；教育而没有爱，那只是奉行法令，如和尚之撞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成果。这一点应当为每一个教师所认识，唯有如此，那才是真正的教育，有意义的陶冶。

根据上述的理论，我们既然要完全重新筹设一所学校，则我们的教育计划，就不能完完全全草率由旧章，遵循传统。而且这所学校，既非国立（指由教育部主办的），也非省市立，

但仍然是公立的，因中英庚款董事会乃隶属行政院之故（湟川中学于民国卅二年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移交教育部改为国立）。由于学校的性质特殊，在遵循法令之中，多少有些伸缩旋回的余地; 而且中央既鞭长莫及地方政府也无权过问, 唯一的办法, 只靠自己好自为之 。于是在国策、法令、地方实际情况等之下，制定本校的教育计划，这个计划是兼顾了教育的理论与实际，无以名之，可姑名之为现实的理想主义。兹将其要点略述如下:

甲、建立校风

任何一所学校，必然自有校风，而校风之优良与否，关系该校之声誉、成绩、效果乃至盛衰。一种优良校风之构成，也颇为不易。学校之领导人如校长主任等固然很重要，而全校教师之通力合作, 一致努力则尤为重要。中学学生正当青春期, 他们的感情颇不平衡, 意志也不坚定，兴趣更是动摇，判断自不成熟，但这些并不就说明这些半大孩子毫无观察力与判断力，他们对人对事的观察与判断，有时也有出人意外的精确。不过他们的观察与判断，并非完全来自理智，感情与意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卢梭当初在青少年的教育方面，重感情而轻理智 。本世纪初期在欧洲发生的人格教育学，仰慕浪漫主义的余风，认为唯智主义的教育学，例如德国新康得派的教育学，尽管其理论体系相当完整，但缺少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缺少了教育者的热枕，于是人格教育学就把教育的重点，放置于教育者的人格之上，由此引起学生爱慕与仰望的热情，从而引发其自觉、自省与自律的精神。人格教育学虽然具有形而上学 的色彩与主观主义的倾向，但重视与宣导教育者的热情与人格这一点, 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校风和任何个体特有的风格, 人们称之为次级文化。所谓次级文化，乃是在整个民族文化笼罩之下所形成的小型文化。这种小型文化，当然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自己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风格，以别于其他的次级文化。这种次级文化形成之后，其举止、行为、谈吐、表现等等，无不表出其特有的风格，使人一见即觉知其所属的个体。这种风格一经形成，就如同一个大染缸，任何人投入其中，就如荀子所说

的，必然会“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了。校风的关系，既然如此重要，则优良校风的建立，乃为学者的首要任务，尤其是新创办的学校，建立优良校风，似乎比较已有的学校，应当是事半而功倍。然而校风一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如一般学校标示一个校训，就算建立了校风；而是要从某几种较为具体的活动着手，几乎逐渐能蔚为风气而形成校风。所以作者拟在湟川中学先就几种活动着手，再和相关的课外活动相辅相成，成为特有的风格，这几种活动，根据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基本教育原则，顺次阐述如次：第一是读书风气的形成。我们在前面引用克欣斯坦纳(Kerschensteiner)的意见，谓有书本得来的知识，是死知识，不能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只有由工作中得来的知识，才是活的知识，才能引起学生的创造精神。他这个说法，多半指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言，如果涉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恐怕无法不利用书本。德国新康得派西南学派的领袖文德班（W.Windelband）把学术分为两大类;一为法则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而言，自然科学主要在发现自然法则，然后根据这些法则研究，以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乃指征服自然。一为历史科学，此指人文科学不能脱离历史关系。另一与文氏同时代的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也把学术分为两大类：一为自然科学，一为精神科学，后者几乎很少脱离历史关系。如果人文或精神科学绝对多数必与历史关联，则书本知识，自无法完全放弃。因此，读书虽不是教育的唯一任务，但也是重要的任务，所以风气的形成，当然非常重要。

湟川中学每晨六时起床，六时十五分升旗，经廿分钟早操后，即开始朝读。我们的朝读，不是在教室举行，而是在校园、大操场、树下、溪边、山脚等地施行。学生人手一册，多数为英文，其次为国文，间亦有阅读其它书刊者。我们在前面说过，学校教师多半为来自北平之著名大学之英俊，且多数毕业不久，好学精神仍然旺盛，故每晨朝读，教师们亦人手一册，加入朝读行列，此即前面所说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染缸作用。不久中央资源委员会在西宁建立电灯厂，现在的行政院长孙连瑞先生，即当时的总工程师。

湟川中学应当是利用电灯使学生作晚修的青海的第一个学校。起先，每晚自修时，作者商请在校老师们，分日每班必有一位陪同自修，故秩序良好。在相当时日之后，不必陪同自修，改为轮流分班分日巡视，以备谘询与指导，当教室内无教师而仅有学生时，秩序仍然良好，据作者巡视可得，教室内虽无教师而秩序井然，乃至安静得掉一根针在地下亦可听见，与大学图书馆内一样。

第二是德育问题。我们知道，道德分为个人道德与集体道德两种，可是这两种道德并不是互不相干而各行其是，而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如果只有个人道德，而无集体道德，则这种个人，只不过是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自了汉而已，毫无益于民族和社会。反之，如果只有集体道德而无个人道德，则这种在集体之内的个人，犹之乎一部大机器内的零件，只能随着机器转动，毫无自主能力与自动精神，绝不能改善或促进集体的发展。职是之故，德育的实施，必有兼顾个人德性的培育与集体道德的陶融，使二者相需为用，相辅相成。我们以勤俭诚朴为训育标准。西北地未尽其利，或未畅其流，物未尽其用，致人也未尽其才，一般人都生活难苦，奢侈浪费、懒惰游荡之风甚微。所以对勤俭朴三者只需加强与稳固，即可达到相当水准。至于“诚”之一字，原为一切德之基础，人生意义之动力。我们对人生价值之发现、认识、判断与实现，无不由此来推动，但如何能达到诚呢？我们知道，诚是一种价值，任何一个价值的反面必然是非价值或反价值。诚的反面是欺，因此，戒欺是达到诚的唯一途径，为人能做到不欺，那还有什么达不到的德？这可由同学与师生之间相互证验，相互勉励必要时施以奖惩来达成。谈到集体道德之陶冶，必须以班级为起点。班级是中小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团体，不仅在形式上为然，即在实质上亦为不可分离的连结要素。要养成学生与其最密切的团体,发生荣辱与共的精神（原文如此）,班级是最好的工具。所以我们经常举行班级之间的各种竞争，以养成其荣辱与共的团体精神。例如我们有过举行各班级教师寝室之清洁检查，由作者本人、值周主任、导师、教官等人组成审核组，

以总分评定冠军，夺魁即获得奖旗悬挂教室及寝室内。因之各班成员，舞步一致努力，争取荣誉。没有人会偷懒，有此等竞争而推及其他，形成团体精神超过个人利害的集体意识，集体道德亦于此陶成。

第三是体育活动。前面谈过，湟川中学所聘任之教师，多为青年才俊，其中不乏长于体育与喜好体育之人。由于各种体育活动有教师的参加与领导，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与热枕，即作为校长的作者，在学生时代就是体育健将，在北大时即为足球校队的选手，当然对于体育之提倡，不遗余力。我们规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时至五时为课外活动，亦即体育活动时间，任何人必须参加，教室寝室上锁，也没有人会逃避；因之，普遍而积极的体育风气，当然很快地形成而经久不衰。

第四是群育。施普兰格曾说，教育是关系个体的，即令是以群体为目标的教育仍然是以个体为起点的。这是因为群体不能作为教育的具体对象，而只有个体才有可能。但这并不就说教育与群育无关，而是说把群体教育寓于个体教育之中，在个性中培养群性，在群性中保持个性。这种群体，是通过个体意识的群体：这种个体，是具有群体精神的个体。过于注重个体而忽视群体，则将造成极端的个人主义;过于重视群体而轻视个体，也会造成极端的集体主义。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我们必须避免而采中庸之道，使二者并重，能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在实施方面，仍以班级为起点，然后推及其他的团体，如前面所说的。这是在校内而言，至于校外，当然以学校为单位，与别校作任何竞赛时，参加的选手，莫不全力以赴，为母校争取光荣。事实上，无论对外竞赛还是对内表演，湟川中学，可以说很少失败过。当时正值抗战艰苦之时，民族意识之加强，民族精神之激励，应是群育的最终目的。民族精神教育之实施，首先加强乡土观念。激励青年爱国，必先鼓励其爱乡。爱乡是爱国的基础，一个对乡土毫无感情的人，绝不会爱国。这就是为什么裴斯塔洛奇及施普兰格诸先贤提倡乡土教育之意了。

综上所述，原本卑之无甚高论，但其中有些举措，在三十余年之前来说，也可以说是创新。任何一种教育设施，如不能形成一种风气，亦即次级文化，必然事倍而功半。只要风气一旦形成，则任何设施，必然会事半而功倍。一种风气之形成，前面说过，必须领导阶级，率先宣导，以身作则，然后影响群伦，蔚为风气。在领导阶级中，就学校而言，校长最为重要。曾国藩曾说“风气之成，乃一二人心之所向”这一二人就是指的领导群伦的社会或政治领袖而言。湟川中学的任何活动，作为校长的作者无不参加。由于作者的参加，其他相关的教职员自无不参加，这几乎成了当然之事。所以湟川中学的任何活动，无不生气勃勃，效果显著。可见校风的建立，乃为学者的第一要务，关系学校四育的发展，至深甚巨。

乙、自我教育

德国大教育家施普兰格教授曾说：“最有价值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所谓的自我教育，乃受教育者基于自觉、自动与自律的精神而教育自己之谓。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他们不再是儿童，也不会像儿童时期唯老师之命是从，也不再事事模仿；现在却要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主张。当然这是指高中学生而言，初中高年级学生，或许也可计算在内。尽管他们的知识还是很欠缺，感情也不平衡，意志更不坚定，兴趣摇摆不定；然而他们仍然自认能做主张，判断正确，有时还很固执。如果要给予他们以什么，必须翻译成为与其志趣想接近的语言，否则他们不会无条件接受。至多只会口服而心不服。这种情形，在高中高年级的学生，最为普遍。所以要使教育获得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们能心诚热服，欣然接受教诲与领导。但要达到这种目的，必先有几个决定性的条件，而这几个条件不在理论的树立，而在能付诸实施兹提要地分述于下：第一是了解。青年期中的青年，虽然都有独立欲与自尊感，但是，他们究应该何去何从，仍不免有茫然之感。青年们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严密封锁其心灵，即令亲如父母，也不让其窥探其内心的隐藏。只有他们认为你了解他了，然后才肯对你公开其心灵，心诚热服地被你领导。他们此时就

像驾驶一条船，进入了一个漩涡之中，团团打转而驶不出来，亟需一个导航能把他引导出来，他会向你倾吐心中所想所欲，希望获得正确的指导。青年们因严密封锁其心灵，就像在精神上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又亟需一个伴侣，而这个伴侣，必须是他认为真正了解他的人，所以了解，乃是使青年心诚热服地第一个重要条件。第二是接触。这里所说的接触，含有双重意义：意识形式上的经常接触，亦即学校所规定的课内与课外的各种接触。二是精神上的接触，亦即默察其言行举措，明了其家室环境，有时举行个别谈话，从而察知其心灵动向，明了其内在蕴 。好在湟川中学之师生，绝大部分均住在校内，无论是形式上或是精神之接触，十分容易。而且湟川中学的班级不多，学生人数也相当有限，即以作者作为校长的身份，对区区四五百个学生，即能呼出每人的名字，其他的训导人员与级导师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形，不仅在今天的台湾不可能有，即在过去的大陆上的学校，也很少有。所以说到接触一点，湟川中学作到了师生一体 ，水乳交融的程度。第三是热情。前面所说的了解与接触，固然是引导学生达到自我教育的重要条件；但要使这两个条件真正有效，却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来推动他们，使之发挥效用，达到目的。这一个强有力的动力，就是热情。我们知道，任何事业，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私事，要想成功，其理论分析，计划周详，固然重要，但要使之圆满达成，则必需坚忍的意志与炽热的感情，后者尤为重要；因为意志坚定，要靠热情支持，意志是帆船上的帆，而热情则是风，再好的帆而没有风，则等于无用。所以热情是推动帆船的风，发动机器的汽油，没有它，一切都不能动，更遑论完成。我们对日八年抗战 ，固然由于我们的坚定意志，但更重要的是炽热的民族感情，所以能百折不回，坚持到底。者就是为什么人格教育学要把教育重点，置于教育者的热情人格只之上了。能把这三种要素，施之于学生身上，导引他们走向自我教育之路，并不是如想像中那么困难。

我们在湟川中学所施的上述教育，当然不敢说都能按照计划与理想实施而能达到目的；

但我们尽力量照这个理想所指示的方向进行，从不能完全达到，但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则敢断言。例如前面所说的朝读与晚自修，没有人强迫他们，而他们能自发、自动而且能自治，由风气的形成而成习惯，这不但减少了学校教务训导方面许多麻烦，而且在养成他们求学作人方面 ，具有极大的效益。当时湟川中学最大的特色，就是课外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文艺的、科学的、体育的、艺术的等等。学生们把这些活动，按其性质，配合校历及季节，订定活动历，经过学校的审核许可，即作为每学期的活动规准。到时按活动历施行，一切由他们自己负责，不必学校操心，他们进行地中规中矩，最多仅有学校的值日导师或教官或体育老师从旁监视而已，数年之间，从未发生事故。这种自发、自动、自治的精神，正是自我教育的积极表现。这种教育原则，能否施之于今日的台湾？作者不敢断言，因为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即令加以实施，未见得有效。不过今日中学中的许多现象，例如结帮组派，集体勒索同学，集体仇杀，集体偷窃，乃至集体抢劫，在湟川中学当时的学生，做梦都想不到，更不必说有这种事实了。这都要拜文化都市化、机械化、电气化、现实化、奢靡化等等事象 所赐。然而在教育而言教育 ，一种具有真理价值的教育原则，应当是地不论中外，时不论古今，永久有效而不变。自我教育为最有价值的教育原则，是具有真理价值的。尽管今天的社会文化 ，处处有腐蚀性，在在富有破坏性，但能坚持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诱导学生步入自我教育之途，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丙、生活教育

这又是裴斯塔洛奇的功绩，是他首先发现以往的教育，都和生活活脱节而专走唯知主义的窄狭之路。他首先提出，人不仅只是制造知识的机器，而必须与生活密切结合。斯普兰格曾在《现代文化问题》一书中，有一篇讨论大学的任务一文。他在这里面指出今日大学的任务有三：即研究，专门教育与人的教育三者，以后者最为重要。斯氏认为这个问题不必争论，因为大学生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正确的领导。由于大学生以后之作人处事 ，

必然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作准绳，而正确的人生观有必然来自正确的世界观。狄尔泰（W.Dilthey 1833-1911）说：“世界观的最后本根，乃是生活”（见氏着：Weltanschauung S.7）生活既是世界观的源泉，则体验生活，了解生活，乃建立世界观的主要条件。但是生活必然有实行生活的空间（原文如此），这就是所谓世界。所以我们要正确地体验与了解生活，则体验与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这是建立世界观的首要条件。

有人认为世界观的建立，应基于一种哲学思想，似乎与生活无关，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任何学说思想的成立，绝不可能从天而降，而是人类全面生活的反映，尤其是整个民族生活的全面反映。由于反映的情况不同，于是就形成许多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自古以来许多学着对于哲学的来源，也有不同的看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的发生，乃由于惊奇，也有人认为怀疑也是哲学发生的要素，笛卡尔就是以怀疑为认识的方法；斯多亚派认为哲学的发生，乃由于人们的忘我与自我肯定；现代存在哲学大师亚斯培司（Jaspers）则补充上“交往”。这些因素无一不与生活关联，尤其“交往”更是重要。因此，以哲学为基础建立的世界观，也是以生活为基础，这是不容怀疑的重要之点。

综上所述，乃是对大学生而言，对于中学生是否适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作为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生，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人生观与世界观。至于高中生距离大学生的年龄，相差有限，似乎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生观与世界观。所以我们至少应为他们先奠定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基础，使他们以后能从实地建立其人生观。这种预备工作，不但应施之于高中，即初中也应及早实施；这就是让他们体验生活，了解生活。了解必从体验而来，而体验则必须在生活中，身历其境，使他们尝试到紧张与松弛、快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进步与退化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后来建立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宝贵资料。湟川中学学生几乎全部住校，学生的公私生活，必须参加，关于求学、处事、做

人等等必然身历其境，作切身的体验（原文如此），由体验而了解，这就奠定了他日建立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

上面所述，多半是关于理论方面，空谈理论无补于实际，必须根据理付诸实行，才能收获实际的效果 ，我们在实际方面，首先提供的是礼节。中国原为礼义之邦，尤其儒家重理。荀子在化性起伪方面，教育上提出两点：一为师法，一为礼义。至于孟子之重视礼义，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华人尚礼，只是指知识阶级而言，一般人则不见得普遍重视，即令是知识分子，有时也不拘小节。至于西方人不论男女老幼，有两个字从不离口，那就是“请”、“谢”两字，无论对何人对何事，必然是先“请”后“谢”，至于早安午安晚安等更是从不离口，而在我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并无此习惯。我国以前规定的晨昏定省，那只是指子女对父母而言，不及他人。所以在这些小节方面，我们似乎并不够完整，是不是我们原来是有的，由于历史悠久，社会变迁，更由于几次的异族统制 而失传了，不得而知。关于这些问题，虽然只是小节，也关系整个文化的内涵，希望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也对这些问题有所研究与发现。我们在湟川中学特别重视礼节，不仅在师生之间重视礼节，就是在同学之周到,继之以奖惩处理，逐渐养成他们有礼习惯，至于家庭与亲朋邻里乡党之间的酬应，其间应遵与应革之处，亦不断作具体之提示。其次是重逊。逊字应含有二义：一是谦逊，一是逊让。其实二者是相通的。谦逊的反面是骄傲，无论一个人的知能有多么高，一经骄傲成习，就会常常蒙蔽其理智。同时，一个骄傲的人，必然不得人缘，久之会形成孤立，凡此都可影响其人格的发展。儒家重逊，论语八佾章谓：“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设关系较为重要的事情，关于原则的事，不能不争，但仍需保持风度。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则争，这极易遭人白眼和遭人杯葛，未免太得不偿失，关于这点，我们不断告诫、提醒与劝阻。第三是整洁。青年守则说：“整洁为强身之本”，的 是真理。湟川中学在这方面，也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在

前面曾说到各班级各寝室的整洁竞赛，但同时也是个别竞赛，因为如果一班一室的少数人的课桌不洁，桌内的书补不整，或一室内少数人的内务不整，当然就严重地影响到一班一室。在个人方面，常常是检查双手、耳后、颈后的清洁。同时，湟川中学备有浴室，供学生沐浴之用。另备灭虫室，室内高温，将衣服置其中，即可灭虫。这回事四因为西北寒冷，同时水源缺乏，如不沐浴更衣，自会生虫，所以沐浴与灭虫必须并行，方可保持清洁。第四是饮食。民以食为天，所以饮食居衣食住行育乐六大需要之首位。湟川中学学生全部公费，伙食一项，交由学生自办。每月各班派出代表组成伙食委员会，再互推一人为主席。举凡购买粮食、菜肴、燃料等等都由委员会负责采购，学校只负责监督之责，他们由此可以体验到生活不易，物力维艰，借以养成精细、谨慎、节俭、计划等等美德。第五是娱乐。湟川中学所在地的西宁，是个落后的省会，即无电影院，也无剧院，连设书饮茶之处也没有，可以所示没有任何娱乐场所，适宜于学生的娱乐，可以说是绝无。为了调节学生的身心，正当而有益的娱乐，有其必要。校外既然没有，只有在校内自己制作。我们的教师几乎百分之九十来自平津京沪武汉等大都会 ，学生亦有不少来自上述地区，于是师生于周聚集一堂 ，各尽其所能，表演各种技艺，如相声、口技、歌曲、平剧清唱、室内各种游戏等。每次无不尽欢而散。这种活动，不仅只是娱乐，而且把师生感情融化为一体，充分表现了爱的教育，教育的爱。

除了上述的五点以外，还有许多活动，几乎都和生活教育相关，在此不必一一举出，留待以后阐明课外活动时，再行提出。因为课外活动有的和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则与生活并无多大关系，视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不是渗入生活教育，所以作者也把它留在后再行叙述。

丁、科学教育

这里所说的恶科学教育是指自然科学的而言。这是我国乃至世界的通病，凡说到科学

一词，必然指的是自然科学。其实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人文科学，例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从一般的习惯，凡称科学，就是指的自然科学。说到中学的自然科学课程，无论在质量方面，是在是微不足道。一般人一为在中学所获得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拿来作为基础，然后在大学里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精进，其实不然。德国现在 大教育佛里特勒(W.Flitner)所着基本精神陶冶(Grundlegende Geisbildung)一书指出“……大学和独立学院在材料方面必须从头开始，至于把中学的知识作为材料，那将微不足道。……”（他所指的正是自然科学，因前后文所述太多，只截取中间重要的几句)。他说：“但是学者基本教育学校（指高中）必须努力，首先培养直观的自然科学；青年们以其新鲜的感觉，活泼的眼睛，作为采集者、旅游者和阅读者，学校在方法上自应予以协助。在这里有一点最重要，就是把方法放在它的原理之中来掌握和练习。”由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中学的自然科学教学，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直观的兴趣和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教导他们练习和掌握方法原理，并不在材料的优先取用。我们就根据这个原则，来进行自然科学的教学。湟川中学的教师阵容，其特色就在自然科学教师充足而优秀。在数理化生物方面，经常保持有专任教师七、八人至多，而且都住校内、授课方面，除教室内非讲授外，特别注重实验。实验一方面可进行细密的直观，一方面由教师示范，学生分组进行实验，由此获得的方法的了解与把握。如果仍有不甚了解之处，由于师生同住校内，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在教学方面，随时鼓励学生发问。当然是与功课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不准任意胡扯。有时也在师生周末晚会上，进行数学与物理化学游戏，由教师主持，学生参加表演，这种科学游戏，适足以引发学生的科学兴趣。为了增进学生的科学常识，鼓励他们作大胆的尝试，有时进行科学的专题演讲，或者进行科学问题的辩论，这些都由教师做具体的奖评，同时指证其错误 。凡此种种，由于学校的大力提倡，教师阵容的优良，而且热心教导，学生也有学习的兴趣热枕，于是逐渐形成风气，大多数学生对科学不但热心，

而且有信心，所以在毕业生中，多数进入大学理工科肄业，为国家社会，培植不少人才。总计自作者参加考擦，筹备至卅四年离开青海，前后仅仅八年，能有如此成就，亦可见事在人为，至今引以为慰。现在湟川中学虽随整个大陆沉沦，但仍有少数学生在自由世界，但愿早日光复大陆，重建自由中国，则湟川中学亦可重现光芒。

戊、劳动教育

劳动之于人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应当有问题的。共产党说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只说了一半，而抹煞了另一半。他们所说的劳动，乃是指纯粹的体力劳动而言，也是用来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帽子，作为奴役人民，压榨人民的口号 。纯粹的体力劳动，不可能创造世界。牛马之力，十百倍于人类，而他们并不能创造世界。荀子曾说，人之力不及牛，走不及马，而能役使牛马，乃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之故。人能群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人类具有的优越的智慧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人类在先天上就有两种人和动物都没有的器官: 一是大脑, 一是比猿猴长出很多的大拇指, 尤其是人类独有的说话器官; 由于前者，人类能巧思设计；由于后者，人类工作方便和能表达思想于是三者合作，能创造工具，使用工具，从而可以利用自然，乃至征服自然。共匪统治大陆后，教育全国儿童说，人类乃由猿猴进化而来，于是全国的儿童都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这个说法，虽然其来自有 ，但却无法证明其正确性。猴子在先天上就没有生就同我们一样的大脑，大拇指和说话器官，因之它们只能永远是猴子而决不能成为人，否则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今天世上就不应当有猴子了。猴子生来就是猴子，永远不能成为人，因为人生来就是人，与猴子绝无关系。所以我们一旦光复大陆，有关这一类的再教育问题，真是千头万绪，着手就相当的困难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劳动对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劳动创造世界指的是纯粹的体力劳动，那将是错误的。凡是具有创造意义的劳动，必然是脑心手三者合

一的劳动，否则那只是如牛马般的机械性劳动，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成果。这又是裴斯塔洛奇的功绩，他很早就提出三 H 主义。所谓三 H，即脑、心、手三者。虽然他这个三 H 主义不是指劳动教育，而是指的整个教育而言，但是，当然也包括劳动在内，三 H 当中的心并不是指的心脏，而是性灵，扩大地说是精神，裴氏所说的心，也含有这个意思在内。不过裴氏没有正式提出劳动教育这一呼吁，但他却正式提出了工作原则，而工作当然就涵盖了劳动，主张国民学校内必须附设有小型工场，至少也要有一个工作室，来教导学生如何计划，如何准备工具及材料，如何使用工具，如何分工合作，如何于工作结束后，收拾工料，清理现场等等，养成其有计划、有条理、能力分工合作、贯彻始终等良好的习惯。湟川中学当然还是没有附设小型工场，但工作室却是有的。工作室中，置备了许多现代化的工作工具，这都是由汉口带来的。我们聘有一为工艺教员，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指导学生利用工具，有计划地进行作业，事后清理现场，都具相当的成效。我们在前面所指述的教寝室整洁竞赛，当然有实际的劳动教育意义。湟川中学建校伊始，可说是百事待兴。即以校内的道路，礼堂饭厅的地坪等，必须整治。当时既无水泥，唯有利用石灰三合土建筑，这一工作，由童军教练率初中学生完成。学校购有校门外大片农地作运动场，但高低不平，有的相差一公尺之多，乃由教官率领高中学生，分组挖土填平，工作备极辛苦。在学校右侧，购有农地一片，原备校舍扩完之用，在未利用之前，将其按班分为许多块，作为种菜之用。这一举措，并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让学生经验由下种、萌发、到成长的过程，使其领悟到与周生生不息之义，从而了解物力维艰，皆有辛苦中得来。总而言之，劳动教育的要旨，在消极方面使学生，洗过去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传统陋习；在积极方面使学生从工作于劳动中获得书本上所得不到的知识，以及其对人生社会的重大意义。

己、美感教育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任教育部长时，曾提出如下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

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在这个宗旨中，道德教育是主要目的，实利与军国民教育是附带目的，而美感教育则是达到主要目的的手段。原来在这个宗旨中，本涵有所谓的世界观的教育。先生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二者。前者是相对的，范围于因果关系与时空限制；后者是绝对的，超轶乎因果律，与时空无关。前者可以经验，后者则全恃直观。故实体世界不可言，若勉强言之，则可名之为道。既有如此一个超越世界，教育家何不结合于宗教家而必须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作用呢？先生以为宗教迫求实体而唾弃现象世界，教育家则否。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乃一体之两面，并非截然冲突，实体寓于现象之中。其所以变方隔绝，乃由于人我之差别与幸福之营求泯，人我之间亦化；合现象之世界个别之意识为混同，而得与实体世界吻合了。于是进而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也就是世界观教育。消极方面，使人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着；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为鹄的。然则如何实现呢？他认为只有由美感教育。蔡先生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我国自施行新教育以来，唯一有系统的教育哲学。由于悬鹄太高，以致曲高和寡，终于不得不放弃这一主张。我们综观其内涵，很显然地是受到了柏拉图与康得的重大影响。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之分，是来自柏拉图与康得的思想，而康得继之；沟通两个世界以美感教育为桥梁，则来自康得的哲学。不过先生将两个学说统一综合运用，并加以修正补充，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为独立创新的理论，而且其中渗有中国思想，例如谓：“人既已脱离一切现象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这种情景就是中国道家思想和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描写的境界了。

我们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的美感教育，并不是指的美术教育而言，虽然它和美术或艺术教育有聊带联系，这些知识充任素材的角色而已。然则什么是美感教

育呢？蔡元培先生并没有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只对什么是美感教育有所说明，他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得所创造，而哲学家未有所反对之者也，……。”至于什么是美感教育，并没有提出简明扼要的定义，不过我们从其阐述中，获得了解。他说：“在现象世界，凡人均有爱恶，惊惧喜怒哀乐之情，随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对之者生美感以外，一无杂念。……是则对现象世界无厌弃而执著者也。人既已脱离一切现象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教育。”由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了解，蔡先生的美感教育并不是美术教育或是艺术教育，这些只不过是美感教育的资料而已。美感教育本身，实际上乃是一种情感教育，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心灵教育，更扩充地说，乃是一种精神教育。美感教育要使受教育者高尚化其情意，超越化其心灵，丰富化其精神，使之对任何具有美的价值之对象，能由直观而移情其中与之合一，这可以说就是儒家索要达到的天人合一。事实上，中国人在古代所说的天，就是指的自然，这个西洋人说的，不谋而合。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这当然可以作到 ，因为这其中，并不涵有任何神秘因素。由于这种关系，则美感教育的实施，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想，而是可以达到相当的成果的。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乃是一种欺骗狡诈，争夺杀戮，侵略战争的记录，我们只读其一页，即知道其全部。所以整个人生，乃是罪恶的渊薮 ，生存与痛苦同义，幸福和幻想等值，随不欲厌世，亦不可得。欲解脱此种痛苦，则非教育所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只有否定意志。否定意志之道，又有不同的方法。如以知识道德的途径求解脱，只是暂时的解脱，但亦可获致心平气和，心无杂念。要获得永久的解脱，唯有如基督之出世之生活，或活佛教之涅槃，才是永久的解脱，照叔本华的看法，世界的本体就是意志，这是他替康得解决那个用不能认识的物自体的问题。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

是意志的具体化，叔氏把它用柏拉图的概念称作理念，这个理念构成审美直观的对象。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掌握了事物的真正永恒形体。这种直观，并非人人能够，只有天才才可能。蔡先生的美感教育，虽然受了叔本华的重大影响，但这一点，则颇不相同。叔氏在这一点上只有天才才有可能，而蔡先生无此条件限制，任何人皆可达到对现象实资料发生美感，一无杂念而对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着之境界。即令达到这种境界，照叔氏之意，也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事实上也只能是暂时而不可能是永久的。一个移情于美的对象之上与之合一而神游其中的人，他能永久神游其中吗？所以叔本华暂时解脱的见解是对的。就算能如蔡元培先生所云，人能由美感教育而解除于实体世界之观念，而所达到的是什么呢» 最多不多是心灵的慰借，精神的满足而已。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只是一些勘破世情、超然物外的清高之士，这和魏晋的清谈之士，高明不了多少，这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世界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乃是以唯生论 与价值哲学为基础所建立的世界观尤其不能与生活和社会脱节；这种世界观以免排斥以唯物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追求大同世界的实现。大同世界虽然也是一种理想世界，但绝对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渺茫世界。它和小康社会一样，也是一个实在世界，并非形而上的选玄想。我们的世界观应针对它来建立，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要求，也是当是 整个世界的愿望。

我们在湟川中学实施美感教育，即根据上述的理论以美术或艺术教育为资料而进行。不过在这里的美术或艺术，应当作广义的解释。绘画雕塑、音乐歌唱、戏剧舞蹈等等固然是艺术，而其他许多活动，诸如体育活动中的许多美妙姿态，体操的韵律活动，诸如体育活动中的许多技巧运用，大多能体现其美；至今文词的优美，讲演辩论的此举态度之美，室内之庭园布置的雅洁之美等等，在在可引起美感而使这些活动之者移情其中与之合一。我们随时制造或利用这些活动来培养他们的直观与欣赏的能力与兴趣，以引入美感教育之路。这类活动，例如话剧与歌舞表演，杂技与趣味活动，学艺活动与体育表演等经常举行，

一方面谓济学生的情绪与兴趣，一方面增进其审美能力；这是在社会环境极端单调，物质条件极端缺乏的情形下，尽可能做到的程度，我们也并不希望学生们能达到时时悬一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的，一如蔡先生所期待的。而且把这种目的期待之于中学生，似乎有点高不可攀了。

庚、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乃指教室上课以外之一切活动而言，不过并不包括实验室之实验在内，因为实验乃是实验室的课业，所以不能被视为课外活动，犹之国文作文，不能被视作课外活动一样。除此以外，所有的其他的活动，都应包括在内。课外活动在中学的重要性，可以说和上课有同等价值。如果一所中学，要使它不流于知识学校而成名副其实的教育学校。则做好课外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以往的中学，多不注重这种活动，虽然也有些课外活动，那只是视同休闲活动，并不注重其教育价值，所以大多数的中学，无法不流于知识学校，而难以走上教育学校之路。过去大陆上那些有名的中学，和现在台北的一女中建国中学 一样，由于它们录取入学的，本来就是优秀的，再入学后于知育方面力下功夫，所以升学率相当地高。它们的成功并不是整体教育的成功，而只是知育上的成功而已。而且他们录取入学的本来资质就很优秀，在经过严格的陶铸，所以升学率就非高不可。湟川中学录取的学生，只是从极度低落的程度中，录取而来的，能在极短的期间内，达到与东南华北的著名中学出来的学生抗衡，这才是如庄子的《逍遥游》中所谓："是其尘垢秕糠，将就陶铸尧舜者也。"从优秀分子选拔出最优秀的不难，要由原来并不优秀者中早就优秀分子，那才是奇迹。当然，如果和氏所把的一块玩石中，并没有佳璧，则任何人也琢不出和氏璧外。进入湟川中学的学生，虽不见得都是下驷，但绝对没有想台北市一女中、建国中学从千百人中选一的机会，则是绝对的。我们虽然不是从尘垢秕糠中早就尧舜，但从具有美璧本质的玩石中琢磨出美璧来，则也是绝对的。这些固然得力与优良师资的课业指导，

但有计划与适当的课外活动的辅导，则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湟川中学的最大特色，就是课外活动的适当实行和历久不衰。作者在前面已在许多地方提到课外活动，但未作有系统之介绍，兹特综合为下列数点介绍如次：

（一） 自治活动。学习自治活动当然乃以各级级会为基础，然后由各级代表组成自治会，因共匪的职业学生惯常由控制自治会而控制全校同学，致造成无穷的流弊，后来乃废止自治会，改为级联会或称代联会，因其由级代表组成。其实这是因噎废食的作法，只要学习处理适当，运用得当，并不在名称为何。湟川中学乃用自治之名，由各级选举代表组成，处理一切课外活动之进行事项，均能负责切实，从未发现渗入政治问题之事。他们负责领导各种课外活动，有条有理，无不顺利进行，圆满完成任务。可见事在人为，并不在于名称为何。自治就是自律（autonomy）是康得的伦理学所要达到的境地，人能自律自治，其行为必善。中学生的自治能否达到这种境界，固不可必；但使他们在这些外在的自治活动之下，体验到自治的价值，逐渐形成自律精神，并非不可能的事。

（二） 学艺活动。这种活动，包括：1.讲演竞赛；2.辩论竞争；3.壁报发行；4.作文竞赛；5.野外写生；6.科学游戏；7.摄影活动；8.各种研究小组之组织等。这些活动，都由相关的教师指导。所有竞赛，都在可与时公开举行。除指导老师参加外，校长及主任，有关导师均出席参加，所以每次都是慎重其事，绝不敷衍了事，因之都获致相当的效果。

（三） 康乐活动。康乐活动，顾名思义，乃寓健康于娱乐之中，或以娱乐促进健康之意。这活动的范围甚广，在湟川中学包括下列活动：1.歌咏；2.舞蹈；3.音乐；4.话剧；5.平剧；6.相声；7.杂技；8.哑剧；9.民谣；10.棋艺等。这些活动中，有些是艺术活动，借这些活动，实行美感教育，可收效于无形。这些活动，都由有兴趣，有专场的同学表演，由有专场的老师指导。这些活动表面上似是纯粹的娱乐，实际上里面涵有很多启发性灵，促进美感的要素，能够善加运用，对政体教育的功用，有不可轻估的价值，我们在湟川中学

经常举行，历久不衰，学生及老师也乐此不疲。举行的时间，多半是在星期六下午或晚间。有时也偶尔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以便星期六回家的同学，也得以参加活动。这些有助于整体教育的价值因素，常常为许多人所忽视，而我们则特别重视，我们相信从这些活动中所获致的无形价值，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四） 体育活动。体育是四育乃至五育之一，关系非常重要，也逐渐为朝野所重视而予以提倡。西北因交通不便，而形成落后状态，体育虽在学校教育方面也聊备一格，但也只是聊备一格而已，并不怎么发达，青海尤其如此，湟川中学在这方面特别重视，自校长教师以下，莫不积极重视，以致形成朝气蓬勃的体育风气。我在前面说过，除了升旗早操以外，由一个时期还在十时以后实施二十分钟的课间操。由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至五时为课外活动时间，冬天提早一小时，任何人必须才能加，教师寝室上锁，不准学生逗留其内。课外活动由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活动计划，呈报学校审核批准，然后编学活动历内，由负责同学按照活动历施行，由教官、童军教练员、体育教师、值日老师等分班监督指导。多年以来，施行不懈，盛况不衰。活动节日限于体育，包括球类田径体操垫上运动等，分组举行，由同学就其兴趣喜好分别参加，无人落空。职是之故，湟川中学学生，绝无从不运动之人，盖风气已经形成，没有人能自外于此风气，也没有人愿自外于此风气。以当时全国的中学而论，体育如此普及而且切实进行不懈的，恐怕湟川中学是少数中的少数。

（五） 生计活动。所谓生计活动，乃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之活动而言。首先关系最重要的是食的问题，湟川中学全部公费，学校将学生名额内应得之伙食费，全部交由学生代表组成之伙食团自己经营。所有采购粮食菜肴燃料等，都有学生代表来负责，学校只负责监督指导之责。学生代表由各班级推选，每月改选一次，这其间各界伙食委员会无不竭尽心智，力求廉美，以期较上届为佳。他们可从这当中，体认生活不易，物力维艰。其次为合作社，由教职员学生象征性认股，再由学校无息贷款，购入消费物品。西北生活原本单纯，

加以抗战时期，物品更为缺乏，故合作社之所备之物品，除生活上必需如牙膏牙刷肥皂毛巾襪子之外，只有必需之文具用品。也有高年级各班，轮流推出售货员，每周更换一次，于每日下午课余时开放。这样也希望他们能从中，稍稍体验出经济意义。再次是工艺活动，此指金木藤竹石膏等工而言，我们在前面说过，湟川中学随未附设小型工厂，但工作室却是有的。工作室内置备了各金木工工具，由劳作教师训练学生使用。他们也可三五人组成一工作小组，合力制成某一产品，如飞机、军舰、坦克车模型或其他日常应用职务。自电灯厂开办一户，学校装有电灯，由物理工艺教员训练学生如何修护电路电灯。还有前面说过的，学校将耕地按班级分成若干小块，每班一块用以种菜，使他们了解宇宙生生不息与农作物得来不易之义。所有这些活动，无一不是西北所必需，学生具备这些知识，无论直接间接，都对社会不无贡献。

（六） 整洁活动。整洁为强身之本，此话信然。这种活动可分为两部分：一为个人的，一为团体的。个人整洁，除外表可随时检查纠正外，并举行不定期检查，即临时集合，分组排队，由教官、助理教官、童军教练、导师等分组检查手、耳后、颈后等清洁。另一方面，督促学生沐浴，带起灭虫等，保持身体清洁。团体方面，则分班分寝室每周举行整洁竞赛，夺取锦标，前已言之。此外，公共场所如图书馆、实验馆、工作室、饭厅、礼堂、校园等亦分区交各班轮流整理清洁，其成绩也计算在负责班级之上。整洁不仅对健康有所助益，而且亦可助长人之美感，故湟川对上述之整洁竞赛终作者任校长七年之久，从未懈怠。

（七） 劳动活动。我们在前面劳动教育中说过，一种纯粹的体力劳动不可能启发性灵，助长创意；必须是手脑心并用的劳动，才会产生上述效果。所以我们推行劳动工作，实行起来，不仅大家会努力以赴，而且做起来也不怎么疲累，有时因有兴趣而反觉得轻松，进度亦快。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大礼堂饭厅的地坪，校内道路，运动场所等工程，都在这种情

形之下完成的。以后有许多工作对象，一本这种原则进行，总期寓教育于劳动之中，逐渐养成习惯，以达到劳动教育目的。

（八） 时事教育。湟川中学在课外活动之中，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时事教育，我们所采的方式，相信没有任何地区的任何学校实施过。当时正是抗战进入艰苦阶段，全国同胞无不一心一德，共赴国难。所以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密切关注抗战形式的发展，只有别有用心的共匪例外。湟川中学地处西陲，当地的传播工作，几乎等于没有，我们只有靠广播及订阅的兰州重庆的航空报刊来猎取消息。所有抗战形势之发展及相关之重要消息，除报纸陈列张贴供共同阅览外，其特别重要者在每晨升旗时作简要之报告，每周纪念周则作更详细有系统之报道。为使同学必须阅报，将初二以上之高三各年级学生姓名，书于薄木片上，置于一箱内，每日降旗时，由值日导师在箱中抽出二人，一作国内之新闻报告，一作国际之新闻报告，不准逃避。其被抽中而报导不出者即予相应之处罚，如此一来，遂至无人不阅报，这一措施，对于学生之时事知识，不但有所增进，而且能训练其整理资料，提纲挈领之功能，这是湟川中学创举之一。、

（九） 研究活动。这里所说的研究活动，乃指学生们就其兴趣，和二三好友相互研究，寻求解决问题，包括科学、文学、艺术、技艺等等。这种二三好友经常为解决问题而时时接触，无形之中形成一种研究小组。他们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否则就求教于老师。在此种情形之下，老师每次解决问题，就会有三五人获益，这又是较个别指导经济很多。学校对于这类小组，不但不予禁止，反而予以鼓励，因为这种情形，无论在学问切磋，品行砥砺方面，均有助益。

（十） 各种竞赛。青年都有贯彻欲与荣誉感。所谓贯彻欲，乃是青年们的主张，都要予以贯彻之谓，和斗争冲突时相结合的。我们要使他们的紧张情绪无需诉诸破坏而能自动地松弛，就得给予他们的紧张生活以更多的自由空间，便他们的贯彻欲与荣誉感，能获得相

当的满足。青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作为欲的驱使，亟需有所表现，所以表现主义是青年的标志。虽然这其间不免渗有虚荣心在内，但健全的虚荣心，也可阻止青年趋于下流。因此，我们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尽量设法给予他们以表现的机会。但是，课外活动固可给予他们以表现的机会，但终不及各种竞赛能满足其贯彻欲与荣誉感。因为竞赛胜利固可使他们满足而即令失败，也能使他们自我反省检讨，再接再厉，以图下一次的胜利。青年永远生活在渴望之中，渴望是使他们力争上游的动力，青年没有渴望，那简直不可想象。所以学校经常举行各种竞赛，来满足他们的贯彻欲与荣誉感，是有其必要的。我们现在把湟川中学经常举行的各种竞赛，列举如次:（一）生活竞赛，包括整洁、秩序、礼节、守时、速写、互助合作等竞赛。（二）学艺竞赛，包括作文、数学演算、讲演、辩论、壁报（包括画刊）、书法、工艺成品等竞赛。（三）康乐竞赛，包括歌咏、乐器演奏、棋艺、舞蹈、平剧清唱、杂技等竞赛。（四）劳动竞赛，包括个人与团体两种，团体则以班级为单位。包括建设性的、生产性的、整洁性等竞赛。（五）体育竞赛。包括球类，田径赛、体操、杂技、精神等竞赛。所谓精神竞赛，乃指守时、守法、胜不骄、败不馁等表现而言。（六）生计活动竞赛，包括办理伙食成果，办理消费合作社成果，生产成果如仲裁竞赛等。上述各种竞赛之说明，已见之于前述之各种教育与各种课外活动之中，不再重复。总之各种竞赛，乃在给予青年以各种机会，实现其表现欲，满足其贯彻欲与荣誉感，引导其步入自我教育之途，而避免误入歧途之祸。作者主持湟川中学七八年之久，从未发现有结帮组派、仇杀群殴、勒索偷窃、谎欺诈骗之事，此固得力于优良校园之形成，而各种课外活动，各种竞赛之实行得当，亦大有助益。这些措施，虽非湟川中学独创，但施行适宜，持久不懈，尤其自校长以次师生共同参加之热烈融洽情况，适足以表现教育爱与爱的教育之具体情操，此点则不可谓非湟川中学之特色。

六、 结论

综上所述，乃作者就记忆所及，拉杂举出，其中不免有重复之处，而遗漏之处，亦复不少。兹将所述个点，值得特加介绍者，概述如次：

（一） 好学研究的精神。我们在前面说过，一所学校的优劣，端在其校风如何而定。一种校风的形成，并不在其校舍之堂皇，学生之众多，而在领导者之以身作则，遵旨上行下效，蔚为风气。 说文解字释“教”字说：“上所施下所效也。”这正说明教育乃上行下效之事。故校风之形成，最重要的是领导人，亦即校长之能以身作则，而大多数教职员能充分合作，则优良校风，断无不成之理。作者甫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在德国柏林大学通过博士考试，指导教授为著名教育家斯普兰格，作者深受其思想只之影响，尤其是教育爱的思想。作者以满腔热枕，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再以自己过去在国内从事于中等教育的经验，加以融会贯通，希望湟川中学能有所成就。幸得多数同仁之赞助与合作，首先在短期之内，奠定了好学与研究风气，真正值得欣慰。

（二） 融洽和谐的气氛。我国儒家思想，向来注重“中和”二字。《中庸》第一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可以从这几句话中了解，未发之情，乃人人所同见的天赋本能，应无优劣之分。关键乃在发而能中节，如发而皆中节，则宇宙万物，必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形成和谐的宇宙。湟川中学的优点，就在一个“和”字。教师方面既无学校出身的不同派系。亦无思想学术不同的冲突。于是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都能融洽无间，形成一个和气的风气，这对学生品性质陶融，人格只修养，当然有其效用。

（三） 勤劳朴实的习惯。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作人作事 的指针。这两句话，固然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但并不就不适用于工业社会。当时湟川中学所在乃十足农业社会，又值对日抗战，更不容许青年懒惰浪费。湟川中学的学生来源。来自贫苦农

家的固有，而来自富裕家庭的亦多，例如中央驻青各机关、银行、邮电等首长的子女，多在湟川肄业，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成为贵族学校，或者如台湾今天的明星学校。这种情形，当然和我们建校的要旨相违背。所以我们绝对禁止学生的衣着用品特殊、用钱浪费，事实上也很难有浪费的机会。所以湟川中学始终保持朴实的风气，至于劳动，我们在前面说过，尽量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因此，湟川中学的勤劳朴实之风，不但不下于别校，而且远优于任何学校，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四） 负责守法的锻炼。中国如简单主张在政治上重人治而忽视法治，在社会上重礼教而轻法规，因之自古以来，国人即未养成守法的习惯。由于守法精神的缺乏，于是徇情营私、玩法舞弊之风气盛行。举凡政治建设、经济设施、文教推行、社会福利等等，无一不在“情”、“私”、“利”三字下进行，即令有少数有少数清高廉能之士，但有时被左右下属之朦蔽包围，亦无所施其技，最多只能做到独善其身而已，这都是上下缺乏守法负责由连带的关系，一个守法的人绝不会不负责任，因为不负责任就是违法，所以我们教育学生，首先养成守法的精神，能守法，则做事必会负责。这种负责不仅是指学生的服务态度，而且要养成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能对自己的一切负责，则为学与做人方面，还有什么达不到的目的。

（五） 活泼乐观的朝气。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除了第二点以外，所指出的，几乎全是教育的严肃面，我们知道，一种教育，如果只有其严肃面而不及于整体，那就只是片面的发展，如我们在前面所责的唯知主义的教育然。要避免这个缺点，学校就得主义到学生知、情、意各方面的平衡发展，亦即整个人格的充实与发展，湟川中学就在这方面，谋全面的充实。我们在前面所举的各种课外活动，即兼顾了知、情、意各方面，使之相互为用，彼此补充而达到均衡的发展。所以湟川中学的学生，并不是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生气勃勃、活泼发扬的现代青年，这一点也是足使我们安慰的。

综上所述，只是举出其荦荦大者，而且事隔之十余年，其中遗漏之处，恐不在少数。尤其是所举的事实中，几乎全是优长之点，未及其缺失，不免有自吹自擂之讥。自古至今，无论就个人或团体社会而言，绝无十全十美的人与事，所以湟川中学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首先有一个不易克服的缺点，那就是由于交通不便与对日抗战的关系，我们除了一批由汉口带来的图书仪器以外，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补充，乃至于教科书的购置，也发生很大的困难。我们虽然，极力克服这个困难，但毕竟仍有不能完全克服之处。其次，湟川中学的教师阵容，在创办初期，人文与自然的师资，颇为均衡。以后的变动，人文科的流动性，反较自然科为大。有时人文科不易聘到优秀人选，不得已另有就地遴才，致未能完全达到要求的水准，不得不说是美中不足。教师中绝大多数的均能洁身自好，但其中难免仍有一二人生活浪漫者，由于学校之优良校风，使其自觉不能适应而自动告退者，亦有其人。 第三，学生的来源，当然是以青海为最多，其次是甘肃，再次是华北及东南流亡到后方来的子弟。 甘青的学生，来自纯粹的农村社会的生活模式。来自华北或东南的学生，就颇为不同。他们在都市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生活上习染，就同西北大相径庭，可能带来都市好的见闻，也可能带来都市中不良的习染。虽然我们已经形成了优良的校风，但一粒极微笑的石子，投入水中，亦能引起微弱的涟漪。我们虽然尽力疏导以减少其影响，终究不能毫无影响。第四，湟川中学的知育措施，由于读书风气之已经形成，绝大多数学生固然自发自动，努力于学业之日进，但总不免有极少数之例外，在某些功课方面，或由于天资笨拙，或由于懒惰成习，我们随尽力补救，终究难达预期之效果。总而言之，湟川中学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但我们自信优点多于缺点，社会亦以此相誉，可谓瑕不掩瑜，微疵不足以掩大纯。它的最大优点，就像我国过去的大家庭，而且是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各守其岗位，各尽其职，是一个努力奋发的家庭。师生之间，岁融洽相处宛如家人，但无形之中仍

有师生地位的存在，所以又是一个有分吋有教养的家庭。这种情形，在当时固不多见，即令在今天教育极为发达的台湾来说，也几乎没有。在台湾的中等学校，师生都不住校，除了上课以外，师生接触的机会不多，时间也很短暂，现在连要求教师留校七小时，还有人反对，认为教师职在上课，下课之后，留校就是浪费时间，这完全是知识教育的观念，永远在作祟之故。仅只是上课，永远不可能达到前述的整体教育之效果。知识的充实，并不就是人格的充实，智慧优越，并不就是人格的高尚。古今来许多大奸大恶之徒，多半是利用知识与智能来危害社会国家的，毛泽东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湟川中学的教育原则，前面分别叙述过，乃是适应《整体要求》，而不只注重知育，虽然我们在这方面也很有优越的成就。虽然我们的整体教育，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基础已奠，道路已开，正趋向目的的途中。如能假以时日，让其继续精进，则它的成就，应当是不可低估的。不幸它同整个大陆中国而沉沦，但愿能早日光复河山，使未沦入铁幕的湟川中学同学，能亲来重建母校，使其能继续走完其行程，达到应达到的境界，我想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民国七十年四月王文俊述于台北　时年八十有一